

访谈录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

研究中华文明的产生一定要结合语言文字

■本报记者 李纯一

谁也没有见过活的恐龙，但自然博物馆里还原出来的巨兽，栩栩如生。科学家们正是通过残存的骨骼、牙齿化石推导出恐龙的大致面貌。研究汉语古音的学者，常常通过这类“构拟”，也称“拟测”“重建”。而他们的构拟成果已成为推动汉语史、古文字、民族语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的利器。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的《汉语古音手册》由中西书局出版。《文汇报》采访了潘悟云教授，请他谈谈什么是上古音、为什么要研究上古音，以及上古音研究的现状。



楚。所以，中华文明探源的语言路径值得深入探讨，应当引起重视。

文汇报：您在前言中提到，手册的创新之处是“从历史比较法转向演化语言学，其根本内容就是自然音变和音变链”。您还说，“我已经看到音韵学有可能发展的高度”，具体是指什么？

潘悟云：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在中外都很类似，最早是依附于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后来重视以活语言为本体，探索语言自身的变化规律，逐渐孕育出现代语言学，而语言学作为科学研究，它的目标是成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所谓成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即语言学希望学习像物理、化学一样的研究路径，对经验世界进行观察测量，再归纳分析得出规则，继用形式科学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对规则进行演绎运算，导出新的规则和结论，最后在经验世界中接受检验。所有的经验科学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目前的语言学，在很多方面还没到达这个程度，但现在有实验音系学、语言类型学等等都在向经验科学努力，希望能够在实验室重现历史音变。演化语言学，就是逐渐往这个方向去做。这就是我说的“音韵学有可能发展的高度”。

汉语历史音韵学在清代乾嘉时期取得了空前成就。不过，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传统的语文学在方法论上难免不足。这里就涉及到，王力先生强调古音构拟、古音演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原则：“有果必有因”。如“格”和“路”两字，用同一个声符，但是后来的读音不一样，说明上古的时候一定是存在着导致后来不同变化的原因的。他的这个意见就是批评清代学者喜欢笼统地说“一声之转”——觉得局部相似，上古读音就可以归为一类。王力先生说这样的方法贯彻下来，结果可不得了，如果都是“一声之转”的话，上古发音“鸡”就等于“狗”，“红”就等于“黄”了。

20世纪初，瑞典学者高本汉把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汉语音韵学研究，把活的汉语方言和文献资料进行对比，构拟出了《切韵》的读音。高本汉的工作开启了汉语音韵学的新时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译音对勘法。这是从德裔俄国学者钢和泰的梵汉对音开始的，利用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大量借词对音。如发现《汉书》里的“乌弋山离”即 Alexandria；“浮图”即梵文 Buddha，“乌”“图”都是上古鱼部字，则鱼部上

古读音为 a。加拿大学者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提供了更多系统和丰富的对音材料。

再后来，学者们认识到，现代的语言结构是古代语言系统演化的结果。结构主义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利用现代语言结构，去推测古代语言面貌，这就是内部拟测法。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董同龢与雅洪托夫，他们的研究是六元音系统得以确立的最重要依据。

文汇报：那么演化语言学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潘悟云：演化语言学是 20 世纪出现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自然音变和音变链。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就是内部拟测法。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董同龢与雅洪托夫，他们的研究是六元音系统得以确立的最重要依据。

关于音变可以举个例子。像京剧里保留了一些比较古老的音，如《苏三起解》里“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里面的“街”念作 kiai，但因为这个 iai 在发音上不容易，比较费力，i 很高，a 很低，就形成两条音变路径，韵母 iai 变成 ai 或 ia，ie。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提出“长元音高化、短元音低化、后元音前化”这三条原理，归纳人类语言最基本的演化模式。他的材料主要来自印欧语的调查材料。但是，几乎没有汉语的材料。我们基于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直至 1000 多种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提出了音变链，这些音变链与拉波夫的音变链几乎一致，恰恰说明人类的音变现象和音变理论是普遍的。这本《汉语古音手册》将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证明。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虚时音变和真时音变。这其实是从天文学借来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看晚上的星空，会同时看到很多发光体，但这些发光体离开地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听到的不同读音，如“哥”，苏州西山念 ka，上海念 ku，北京念 kv，广州话念 kō，就好比我们看各个发光星体有不同的亮度，而这个不同是星星和地球的距离远近造成的。根据亮度，可以推测一个距离我们 1000 光年，另一个是 200 光年。语音上能得出时间先后也是同理，我们没有古代真时的记录，明确说这个原来读 a，然后读 o，再后来读 u，但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采集到的地理上的共时分布，通过语音自然演化的音变链，整理出历史上变化的路线。这就是通过地理上的虚时来还原真时变化。

在手册的基础上，或可构拟出原始汉语

文汇报：近年来发现、公布的大量出土文献，对您的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古文字和上古音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听说这部手册有不少古文字学者的参与，相关构拟也用了不少出土文献材料来检验。

潘悟云：研究上古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就是古文字。原来我们基本上是用传世文献，像谐声字原来主要用《说文》系统，假借就是看传世古书里的通假字。近年来多了不少出土文献，新的古文字材料改变了许多既有看法，像很多谐声关系，是《说文》里没有的。目前，上古音的研究核心还是谐声分析，这是汉语内部的证据。民族语和亲属语对比，是外部证据，当然最理想的是能互相印证。

出土文献里的汉字材料，可以纠正《说文》在字形分析上的错误。像陈剑《释“造”》一文就指出，《说文》里是“造”从“告”声，但现在从楚简秦简里发现，“造”的声符不是“告”，跟“告”有明显区别，上面还多了一笔。张富海也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井”和“井”字，也是中间有一短笔。好多个字，加了一笔，就起到了区别的作用。这些古文字材料区分了原来这些谐声系列当中声母的不规则对应，证明《说文》的有些说法是错误的。现代古音研究和传统音韵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越来越讲具体的语音条件，需要材料的证据推导。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谐声系统是以雅音为中心。东周时，周平王东迁，洛阳人说的音被定为雅音，也就是标准音。孔子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但是洛阳的雅言其实是首都地区的方言，而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里，有很多通假字。通假字之间的差异，说明当时文字记录里有不同的方言。

例如，第一人称雅言为“吾”，读 *qa，但是郭店《老子》里，第一人称用“居”（“居以寡辱也”），“居”雅言读音是 *ka，这里“居”是马王堆方言中的读音，就是方言用字。还有楚文献里的“虞”，其中的“虎”（“乎”）都是声符。虎是晓母鱼部字，读 qha?，小舌音。乎是匣母鱼部字，读 *ga。估计楚国第一人称可能读 *ga。还有秦国表第一人称的字写作“虞”，为什么用这么写的字？只能说明当时的读音与雅言的“吾”是不一样的。

汉语雅言的第一人称，尤其是藏缅语里的第一人称，最多的读作 qa，或者 qa、ga，还有读 nga，这同我们刚才讲的出土文献里的通假字读音，是相吻合的。这都足以说明，汉语雅言演变到汉语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形态的方言。

高本汉将现代各地方言作历史比较，得出了汉语中古音。现在，我们有了《汉语古音手册》的上古汉语雅言的拟音，同时还有不少上古汉语方言材料，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的历史比较，或许可以构拟出更古老的原始汉语！特别希望研究古文字、古音韵和民族语的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方向。

（感谢王弘治教授、张富海研究员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题图：良渚古城遗址 资料图片

东汉以前，都是上古音

文汇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上古音？上古音和上古汉字的关系是什么？

潘悟云：类似的手册还有数种，我们这部叫《汉语古音手册》，而不是汉字古音手册，这是不一样的。语言的最小单位是语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是音和义的结合体。不过在音形义三者中，汉字的表音性最弱。目前构拟上古音最重要的内部方法，一是通过古代押韵，一是通过汉字的谐声和通假。

那上古音指哪一段时间内的读音呢？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主要有这样三个语音特征：一是韵母鱼部字的读音为 a，二是声母存在辅音丛，类似英语等语言中的 kl、bl。汉语的辅音丛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不难找到它们的踪迹。比如，古汉语的一些联绵词如“扶摇一颺”，现代方言里一些分音词如“窟窿一孔”等，很可能就是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残迹。三是还没有以音高变化为主要区别特征的声调。汉语的声调来自上古不同类型韵尾对发声态的影响，可能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真正发现汉语具有四声之别要到南朝齐梁时期。

这三个特征从先秦到两汉一直保存。从上古音到中古《切韵》音，期间经过了漫长的变化。方便起见，我们暂且把上述三个上古音特征的下限定到东汉末年，即：东汉以前，为上古音。古代的语言发音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能从文献中窥见其貌。所以，我们明确上古汉语就是东汉以前所使用的文献语言。我们只收录传世文献中的上古用字，共有 18887 个字。

文汇报：许多人看过您用上古音念《诗经》的视频后，都会问为什么这念法跟现在的读音差别这么大？

潘悟云：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点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时间观念和别国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觉得一千年的时间马马虎虎都是很近的。但如果讨论美国的历史，三百年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不存在呢。最早的斯拉夫语文献语言，老教会斯拉夫语，年代大致相当于北宋。中古英语的历史时期大致对应我们的元明两朝，貌似较为晚近，但对英国人来说已经很久了。当时的大作家乔叟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如果不作翻译，现代英国人多数看不懂。而我们构拟的上古音，是东汉末年之前

的汉语读音，距今已有两三千年的，所以跟现在读音差别非常大。现代南方方言里保存的古代语音特征相对比北方方言多一些，如闽语许多特征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听起来和现在的普通话迥异，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不同汉语历史音韵学家的上古音拟音差别也很大。且不要说王力和段玉裁，即使是我与郑张尚芳的构拟，也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 1960 年发表过两篇突破性的论文，70 年代的音韵学家根据雅洪托夫的研究，一起努力得出一个关于上古汉语构拟的共识，再进一步合理推理，才建立起了新的上古音构拟体系。这就像天体物理学里的宇宙大爆炸假说一样，材料少、距时远，也没法儿实证，但是逻辑过程严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构拟的共识之一，就是上古六元音系统，中国（郑张尚芳、潘悟云）、美国（包拟古、白一平）和苏联（斯塔罗斯金）等学者从一开始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各自用不同材料和方法得出相同的构拟结论，说明它是一个相当科学、相当成熟的构拟。不过，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体细节，分歧在所难免。

从“稻”字探索稻作文化的传播

文汇报：印欧语系的构拟帮助还原了西亚和欧洲的史前史，对汉藏语言演化的了解，无疑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史前史。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文献记录最丰富的语言，也是这组语言中可追溯年代最为久远的语言。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汉语上古音构拟与中华文明史前史探索的关系吗？

潘悟云：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探源，主要有三个窗口：遗传，语言，考古。遗传是生物的演化，考古是文化的演化，语言也同样发生着重要的演化。做文明探源，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考古，遗址、遗物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语言就是这些遗址、遗物的概念和名称的历史记忆。

我举个例子，在中国的河姆渡、良渚、泰国的班清、印度的泰米尔这些距今 5000—9000 年的遗址，都可以看到稻米的实物。同稻米这一实物相对应的语言，就是“稻”这个词。那么稻的实物以及“稻”这个词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呢？现在的考古研究就在争议。不过，实物的演化同语言的演化应该是相一致的——实物有传播的时间，概念和词的传播也有相对的时间。实物传播的时间有时候很难确

定，但是各语言中词语的读音却可以根据自然音变来推断相对的时间早晚。比如一个语素在 A 语言的读音是 g-，B 语言读音是 g-，根据自然音变规则 G>g，可以推测 A 语言的读音形式比 B 语言更为古老。

良渚文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稻作文化。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龙国贻正在合作，试图通过“稻”字的自然音变，推演出稻作文化的产生时间和传播路径。

稻，定母幽部字，上声，根据它同其他字的谐声关系，我们可以把“稻”的汉语上古音构拟为 glu?。声母最早也可能是小舌塞音 *gl-。侗台语的“稻”，名称很多，我们把侗台族群的稻米的名称全列出来，经过历史比较可得出原始音大约是 *glu?。那么到底是侗台语传到汉语里，还是汉语传到侗台语呢？从历史上看，汉族的谷类里，最重要的是粟，即小米。五谷的排列里，“粟长五谷”，中原传统的“五谷”有两种说法，一种包含稻，一种不包含稻。但粟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的出土遗址年代比黄河流域要早。所以，我们推测 *glu? 是从南方的侗台语传至汉语。

苗瑶族群“稻”的名称更多。如果从词根来看，最重要的是 *blu，那么这与侗台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是从 *glu 变 *blu，还是 *blu 变 *glu 呢？根据自然音变规则，g 受圆唇 u 的同化变 b，相反的情况很少。所以“稻”应是侗台语传入苗瑶语。再来看南亚语，“稻”多作 gu，有时前面有个鼻音。稻作文化的先后，通过考古发掘难以判断，但由“稻”这个词的演变大概可以看出稻米的传播过程：侗台→汉、南亚→苗瑶、南岛、藏缅、泰米尔。

研究中华文明的产生，一定要结合语言文字，才能把有些问题讲清



▲ 潘悟云《汉语古音手册》（中西书局，2023）

安 ān 声母声符及拼音

00005 安 乌寒 影寒平一开 ?an 元? qan

流水号 字头 反切 声韵调等呼 中古音 上古音的拟音

文汇报学人 第 592 期

▲ 手册表说明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言说

朱璐

先秦时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辨明期，诸子围绕着道与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经过之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积累，在东周这个王权控制式微的时代里，先秦诸子的思想和言论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根基，也获得了空前自由的社会和政治舆论环境，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先秦诸子莫不为宣扬和实践自己的思想而竞相奔走，他们以兴邦救世为己任，席不暇暖、墨突不黔，以求实现各自的治世理念和“天下”情怀。

在先秦时期，政治上最具功效与影响力的学派，当首儒、道、墨、法。儒家学说主要是内圣外王之学，其中，内圣的主要内容是养心性、修德；外王讲的是事功。儒家主张以内圣之修而取得事功的成就。如周桂钊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中指出，“外王就是政治哲学”。儒家内圣思想的某些元素，如格君心之非、儒生的任道取舍、政治气节、为天地立心的自道意识、民胞物与的价值关怀等，均可视为政治哲学的命题。儒家政治哲学论事功、论政制，与此同时亦讲心性，政治事功与道德修行的相生相济，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儒家的外王事业，是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的外王事业，先有修身，

后有治国平天下。

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所包舍之诸问题也。”然而，对于中国先秦时代，黑格尔认为，“思辨的哲学是一点都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東西”。因而在黑格尔看来，先秦时代的中国不可能存在政治哲学。

莱布尼兹对中国政治文化有别样的看法，他在《中国近事》中写道：“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的确，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于谋求社会的和平与建立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以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给对方造成的不适。”罗素亦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远非“教训”那么简单，他称赞中国的伦理思想：“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为重要。这些品质中，和气是最重要的。”

与古希腊同为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时期，其政治哲学开展的范式是道德哲学。然而，这种以道德哲学为载体的政治哲学形式，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道德教条而已。中国先秦时

代的儒家政治哲学有其自身的言说系统。梁启超说：“先秦政治思想有四大潮流，一无治主义，二人治主义，三礼治主义，四法治主义。”先秦时期的思想，如同古希腊的思想传统一样，千折竞流。而这一辨明期的本质，便是不同政见之间的攻伐和争论。先秦儒家政治的言说，首先是在与其他学派尤其是墨、道、法关于道与德的问题的攻辩中展开的。张立文指出，“道德之意”是先秦时代的核心话语。

儒家对道德的理解是多维的，儒家道德之意的核心义是仁，而反映在政治哲学思维中，便是仁政。然而，儒家仁政思想的由来，是尧舜、文武圣王之治。《史记》言：“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孔子奠基儒家思想，对自己的定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庸》言明了孔子所述之内容，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解“祖述”之意为“远宗其道也”，可见孔子远宗尧舜之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孔子取法文武之道。

尧舜、文武是儒家道统的先河人物。先秦儒家政治，以尧舜、文武之道为演绎主线，在儒家学派内部，孔、孟、荀三子的取法不一。其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主心性，言必称尧舜以道性善；荀子则绍继文武

制礼作乐之制，隆礼而重法。孟荀之间体现出主心性之主礼乐，任德治与礼治的不同。然而尧舜之道本义为何？文武之道本义亦为何？尧舜、文武之道之间是否亦有所差异？

从先秦论及尧舜的相关文献，如对《尚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系统梳理，可以归纳出尧舜之道包含的共同内容有：中道、孝悌之道、亲亲之道、尊贤之道、为民之道。考察文武之道形成的历史，如文王之德与武王克商、周公进化天命王权论，可知文武之道不仅包括文王、武王之道，亦包括周公之道。其主要内容有：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为形上理论根基，以“敬德保民”为核心内容，以制礼作乐为具体落实。文武之道，体现了儒家政治以“仁义”诛一夫的革命正义论思想，以及对政权合法性来源问题的合理论证；而从“清华简”《保训》篇对文武之际遭命授受的解释，可见“中”道亦为文武之间承传的根本。

在以前的儒家道统言说中，尧舜、文武之道均淹没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统称之中，而鲜有人意识到其中亦有差别。事实上，尧舜与文武存在大同与小异，存在孔子所谓之“尽善”与“尽美”之异，还存在主心

性与主礼乐之异。尧舜、文武之同，可归结为：以民为本，以及允执厥中这两个先秦儒家政治的基本议题。其中，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关怀；而允执厥中，形式上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原则和方法论，但是分析《中庸》《论语》《尚书》及《清华简》《保训》相关内容，可知中道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实质性内容为“以民为本”思想，当是民以于天命的思想，体现了先秦儒家政治天人合一的逻辑架构。

参照波比奥的说法，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所寻求的最优政体为“尧舜之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天命王权的思想，其本质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取法的言说方式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方法论为“中”道思想。

孔子深知尧舜大同之道不合于当时社会之政治环境，因而合理的取法是将之确立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日新其德，日臻之而求止于至善。而尧舜、文武主心性之主礼乐之异，则胎息于孟子与荀子在政论思想上主心性德政与主礼乐法制之异。孔、孟、荀对尧舜、文武之道的不同取法和言说可视为对其的变奏。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